

▼争鸣

联大八年

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

犀利如刀笔,活画真性情
钱端升、金岳霖、张奚若、曹昭抡、闻一多、冯友兰、
吴大猷、潘光旦、杨武之、吴晗、华罗庚、
吴宓、傅斯年、梅贻琦……大师们我们为人知的一面关于西南联大,学术界公认最珍稀、最有价值的资料莫过于
《联大八年》
1946年初版,60年后首次完整再版
唯一由当年的学生自行组稿编撰出版的一部联大文献

《联大八年》重版印行后,受到了极大的关注,针对该书的质疑之声也不绝于耳。为此,我们特约请该书责编就读者的质疑撰文作答。

——编者

承三三友朋告知,读到钟岩苑先生的《究竟是谁的西南联大?——评<联大八年>》(载8月25日《南都周刊》,下称“钟文”),我作为该书的责任编辑,似有必要稍作回应,并借此次机会略申鄙见,请钟先生及其他读者指正。

《联大八年》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

钟文批评新版《联大八年》(下称“《八年》”)是一本“没头脑”的书,缺乏相关的背景介绍,并指责出版方“懒惰”。其实这个“懒惰”,自我辩解的话,主要是出于“慎重”的考虑,一来是个人见闻有限,学术水平低,担心自己的一知半解造成不必要的误会;二来是这本书确实不太好做一个全面的介绍,这跟联大研究的现状有关,如钟文所指出的,“相关研究书籍简单粗陋、几无学术性可言”,所以我们只能藏拙,以待高明。

为此,钟文对相关背景做了一番梳理,于读者不无裨益,但也不乏值得商榷之处。一是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饶佳荣

联大的解散时间。《八年》“后记”就指出“本年(指1946年——引者)五四,联大举行毕业典礼”,由此可以判定西南联大事实上在该年5月4日宣告结束。所以“出版说明”第一句话并不是自相矛盾之语。再者,按照钟文的说法,联大解散于7月31日,该书于10月出版,“出版说明”第一句话的逻辑关系照样成立。(钟文末尾推荐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就以五四作为联大完成使命的时间点,详参此书第376—378页)至于钟文根据程法俊的回忆文章及《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称,《八年》于1946年10月出版,这很可能牵涉到《八年》的版本问题。该书“后记”就谈到当年出版的难题,最终不得不把全书分为三册出版。但囿于条件,笔者并未亲眼见过1946年10月版,出版时采用的底本是1946年7月版。此外,署名问题跟版本可能也有牵连。新版采用的底本版权页上写着“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我们只是加了一个书名号。看来《八年》确有不同版本,“出版说明”应该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但我考虑欠周,使读者误解,真是愧怍万分。倘若再版或加印,我们将稍作说明。另外,热心读者如有条件——探测这些版本,研究一下各版本的差异,想必会有所收获。

钟文批评《八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一再强调该书的“政治宣传性质”,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该书“后记”有言,编辑《八年》主要是为了总结联大各方面的活动,让更多人了解这所大学的情形。当然,我并不否认本书某些篇章客观上会有政治宣传的作用,但有这种作用,不能等同于纯粹的政治宣传。

由于这个关键性的“迷思”,造成钟文对本书的判断就是全面的意识形态化,放大了他的阅读感受,大肆渲染该书的政治宣传性。比如,钟文认为该书只记录了左翼学生八年,但没有记录普通学生和右翼学生八年。其实,该书第一部分粗线条地勾勒了联大八年的历程,由于写作者的思想倾向,自然会带

上他们的意识形态色彩。再则,该书第二部分有相当篇幅涉及普通学生的衣食住行、兼差、从军、译训、社团等各种生活,表现的是住在联大新校舍的学生、女生、一年级生、先修班学生、从军学生、参加译训的学生等不同群体,并不是清一色的左翼学生。还有,如果仅仅纠缠于“左”“右”之争,看见左翼就大加挞伐,看见右派就拥抱喝彩,那么我只能遗憾地说我们现行的教育实在太“成功”了,因为我们只学会了像小孩子非黑即白地判断好人坏人一样判定左翼右翼,并进而得出左翼坏右翼好的“宏论”。果真如此,夫复何言?

另外,钟文把《八年》的主要内容概括为攻击“异己”、赞美“同道”,又说该书“字里行间,血雨腥风”,还把激烈的思想斗争夸大为“磨刀霍霍”,这都是典型的“以偏概全”——倘若只是追求语言的生猛也就罢了,但这样也就失去书评应有的严谨了。

怎样看待《联大八年》?

钟文想对盲目的“联大热”做个冷处理,破解联大的神话,其本意是不错的,但作者把新版《八年》称为怀旧风的巅峰之作,则未免让人哭笑不得。细读本书,就可发觉联大并非一片和谐,那里的天也不总是“明朗的天”,相反它也有“死一般的沉寂”,有赌博,有show hand,有“不正当的恋爱”,也有“踌躇、彷徨和窒息”。联大教授也不尽是高文博学,儒雅倜傥,也有“绣花枕头”,也有“一无所长”的。所以,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本为联大神话“祛魅”的书。

西南联大是一所很特殊的大学,始终处在战争和革命的阴影之下。这也是拙文题目的用意,我希望读者切实注意西南联大存世的背景,这对于理解联大及《八年》都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抽离具体的历史场景,空谈联大以及《八年》的好与坏。就个人而言,我从书中可以嗅到那个时代的空气,激烈凶猛,大有惊天风雷隐地来之感,继承了五四遗风、

拥有浓厚五四情结的知识青年身上仍有一股传统“土”的精神和家国情感,又有现代知识分子对自由和民主的向往与追求,所以联大是擅长于“造”运动的。当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书中的一些措辞和质疑隐隐让人感到恐怖,比如“人民”这个词的反复出现,以“人民”的名义来说话行事,这似乎象征着一种新话语的崛起,一种新观念的诞生。当“人民”铺天盖地来到象牙塔的时候,那很可能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勃勃生机就此湮灭,“美丽的新世界”也将随之降临。

窃以为,这本书的出版意义在于,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便利,我们可以借助它进入那个抗战已经结束,革命大潮风起云涌的历史岁月,用当下比较时髦的话说,就是回到历史现场。至于读者从中看到什么,那真是各花入各眼,是看到热血青年的义愤填膺还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迹象,是关注联大在艰难中刚毅卓坚之志还是期间的种种龃龉、愤懑乃至醍醐,那取决于读者个人的眼光和判断。无论如何,历史需要理解,而不只是简单的是非判断和左右之争。要是读者是个有心人,他也许可以藉此深入表象,探寻历史的肌理。易社强先生就是读过此书之后开始其联大研究的。总之,《八年》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后记”直言不讳地表示该书的编辑与联大无关,所以跟许多回忆录、纪念册相比,它无比真实,真实到我们可能都会战栗。这种赤裸裸的真实自然有其“难看”的一面,也肯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恰恰因为这种难看和缺陷,更加深了它的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说,要了解虚拟的浪漫的联大,可以看鹿桥的《未央歌》;要对联大有个通盘的了解,可以看易社强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要看当年学生眼中的联大,则必读《联大八年》。

《联大八年》,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新星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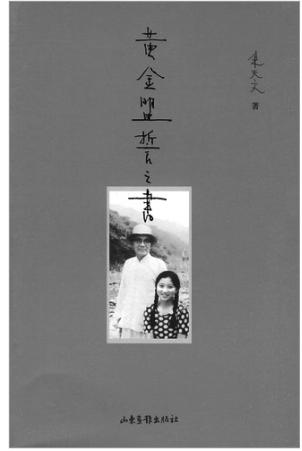
▼新书品荐

主持:朱航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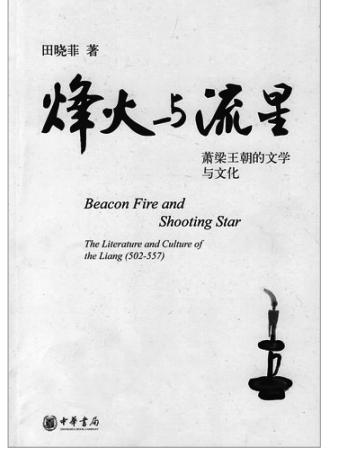
《河东集》,止庵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年7月出版

止庵关于自己笔名有这样一句话:“我想象中读书的所在只是一处‘庵’——荒凉里那么一个小草棚子而已。”这让我想起知堂的读书趣味来,而止庵所欣赏并取法的也恰是知堂与废名的文章境界,他向来对于张牙舞爪甚至拔剑怒张的文章比较厌恶,而向往枯瘦平淡的境界,这本是个人喜好与气质所定,但读得多了,最终发现还是那些扎实平淡的文章值得反复来读。《河东集》收入复旦大学出版社策划的“三十年集”系列丛书之中,所选文章皆为学者生命脉络中的重要篇章,止庵此著的与众不同在于,早年写诗歌也写小说,而后却多写读书随笔文章,小说诗歌这样易于获取俗名的东西反而基本放弃;其次是他的文章以扎实的史料作为基础,写文章大多都是言之有物的篇章,他曾坦言自己即使写一篇千余字的读书笔记文章,所费的工夫则可能是读完所需要评论对象的全部作品,这种功力和耐心在今天或许会被认为是一种笨伯的做法,但恰恰成就了他的文章。他所读书及论述大都从自己的趣味出发,尽管没有那种知识分子所常犯的“救世主”毛病,但我以为那文章的骨子里却是极为清醒的。这倒让我想起他在关于自己笔名的文章中的另一句话来:“庄子·德充符》云:‘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惟能止足。’我喜欢这个意思,我是想时时告诫自己要清醒,不嚣张,悠着点儿。”



《黄金盟誓之书》,朱天文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0年1月出版

阿城在给朱天文《最好的时光》一书的序言中,称赞朱天文为文学界的“稀有金属”,我读这册书后感觉这比喻实在有趣和精确。朱天文的文学之路,彷彿是一种被融化和升华的过程。她出生在一个文学世家,父亲朱西宁与母亲刘慕沙都是台湾现代文坛著名的作家,特别是父亲朱西宁,曾经与现代文坛著名的女作家张爱玲有所交往,并且是资深张迷;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难怪朱天文、朱天心以及朱天衣三姐妹都会成为台湾有名的作家。因此,朱天文在文学上的早慧让人惊叹,后来经过父亲朱西宁的努力,朱天文与朱天心拜到台湾进行客座访学的胡兰成为师,文学才华一跃而升,格局气象为之一新。《黄金盟誓之书》便是这样的一册事关自己文学命脉的著述,其中她对于胡兰成的追忆与论述最是动人,特别辑有“记胡兰成八书”系列,分别为“狱中之书”、“忏情之书”、“优昙波罗之书”、“黄金盟誓之书”、“神话解迷之书”、“弥撒之书”、“阿难之书”、“忘情之书”,并且此书的封面采用朱天文早年与胡兰成郊游时的一张黑白照片,那年迈流亡的胡兰成与青春秀气的朱天文在一起,似父女又有情侶之感,由此可见,胡兰成对其实文学生命的重要。似乎朱天文每一次的文学变化与成熟,都有一位特别关键的人物出现,他们仿佛是一种文学的催化剂,让这块绝世稀有的金属变成真金与绝品。



《烽火与流星》,田晓菲著,与文化·田晓菲·中华书局
2010年10月出版

▼书评

寻觅散落于喧嚣尘世的人文薪火

□田夫

下车没有令人讨厌的台阶),以及新西兰境内的“绿”和交通管理之“严”都令人印象深刻。

在吴晓煜作品中还有一种非常可贵的品质,那就是忧思深广又满肚热肠。他的目光总是穿过高耸的楼宇和繁华的街市看到低矮的屋舍和寻常百姓。他是一位心系民生的知识分子。郑板桥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是贯穿吴晓煜各类作品的情感基点和思想基础。即便在中国煤炭碑刻中,你也能通过《字字泣血的清理煤窑碑》《清代死难矿工墓志铭》《知县董作栋清理煤窑碑》等短篇文字强烈感受到这一点。同时,他的游记里也随处可见类似小贴士的介绍,读来令人舒心。

吴晓煜的游记不是停留在对客观景物的静态书写上,不是堆砌资料、词藻华丽却言之无物,而是录下“我”的观察和感悟,这使得作品具有真切感和感染力。他的文字非常直率,用他本人的话说是“直抒己见”。其实在适当的地方也应添些“曲笔”和“闲笔”,那样会使文字增加醇厚蕴藉之美——类似在《华夏与海国游记》中的《在飞机上读云》写出“云的峭壁”的那段文字“云像白色的充满积雪的悬崖峭壁,飞机贴着这云的峭壁,小心翼翼地掠过”,还有写好望角都是向一边斜长着的树木,都令人难忘。

(《华夏与海国游记》,吴晓煜著,中

吴晓煜已出版的十几部作品涉及煤炭史志、游历见闻、学林漫笔、辞书杂记、酒史钩沉、疾病传播等诸多领域,显示了他沉厚的史学功力、诗书功底和博闻强记、勤学好思的禀赋。我们阅读这些作品,就如同在人文地理的世界版图上寻宝觅胜,又似置身于作者笔下的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面对的是“这样空间开阔、面积博大的建筑物”——确实,拥有开阔的视野、巨大的精神体积和炽热的情感温度,是吴晓煜作品的特征所在。因此,我们阅读时的心境是跟着作者笔下的景象和感悟而流动着的,是充满了新奇和惊喜的。

研读吴晓煜的《中国煤炭碑刻》《华夏与海国游记》等作品,可以感触到这样一个写作者的形象:他是专业的煤炭行业管理者,也是专注的煤炭人文地理学者;他是自在的旅行者,也是自信的文化传播者;他是忧思深广的思想者,也是满肚热肠的对话者。他的作品看似庞博,但闪现着一条主线,就是执著地寻觅散落于喧嚣尘世的人文薪火。

吴晓煜长期在煤矿工作,后又担任国家煤炭行业的领导,参与制定了一些重要的煤炭行业法规,并且在工作之余悉心调查研究、搜集资料,写出了《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煤史钩沉》《名人与煤炭》《中国煤炭史志资料钩沉》《矿业史事杂俎》《中国古代咏煤诗》《中国煤炭碑刻》等煤炭史志方面的人文读本,一改煤炭行业沉寂幽暗的形象标识,赋予煤炭行业浓厚而鲜活的人文气息。这些作品堪称一盏盏照亮煤炭行业历史巷道的宝贵的矿灯。而在此背后,是作者长年不辞辛苦的劳作,比如为寻找煤炭碑刻,他踏访偏远的村庄,乃至在烈日下在山上工作很长时间。他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潜心搜集资料的能力是完成这些作品的基础。

吴晓煜选择的是自费的自由的个人旅行而不是有组织的参观,他的作品更是从诗、碑、笔、竹以及山水、饮食等人文符号入手,传播中华文化,阐释人格与操守。如《华夏与海国游记》中的《扬州个园看竹》《湖州茶文化》《绍兴沈园谈陆游唐琬之爱情》等篇什。再比如,他写到的吃镇江蟹黄汤包的“嘴上功夫”(为防烫,需先开窗、后喝汤、三吃光)、扬州冶春花园茶社的冶春蒸饺、京城老字号“砂锅居”等饮食文化都令人着迷。作者还细心留意了海外现代文明的细节,向我们做了精彩的介绍,如应当向日本“勉强”(日语中的“勉强”意指学习)的地方——方便的火车交通和体贴的车厢设计(车门边的“非常席”、暖和的座位、上

艾黎·福尔是位很好的向导

□许彤

艾黎·福尔(Eli Faure),作为法国的艺术史家和文笔流畅的散文家,在法国影响很大,《法国人眼中的艺术史》这套艺术史丛书是他毕生心血的最好凝结,不仅在法国一直经久不衰,自他去世后,他的这套艺术史著作在欧美各国也不断再版重印,十分畅销。与其说此书是一部艺术史名作,毋宁说是一部漫长的文学史巨著,艾黎·福尔在分析艺术的同时,更探索了人类精神的发展历程。

绘画、雕塑、建筑、工艺品、城市、园林……这些分门别类的艺术,在作者的笔下相互交融彼此关联。艾黎·福尔在讲述艺术的同时,又结合了一个时期或一个地区的宗教内涵、文化背景、精神浪潮,甚至科学与工业的发展。通书,艾黎·福尔以一个法国人特有的优雅和抒情方式,向我们展现了全人类的艺术成就。从旧石器时代到20世纪初期,时间跨越了三万年之久。这位法国人赠给每一位读者一条小船,以及一副船桨。顺着漫长的历史之流,我们跟随着艾黎·福尔沿路欣赏了太多的风景。这套艺术史就仿佛一本详细的全球文化旅行指南。艾黎·福尔是位很好的向导,他带领着我们,足迹几乎踏遍了地球上的每一片重要土地。这趟穿越时间、跨越文化的旅程,从原始时代的欧洲开始,那里我们首先可以驻足于原始洞窟的先人手印和众多动物造型,再经由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去领略亚述帝国的骁勇和残暴,以及逝去的巴比伦文明的奢华与优雅。从中亚到非洲,艾黎·福尔又带领我们横穿红海,进入古老的埃及文明去瞻仰法老的陵墓与神庙。在古老的东方之旅结束之时,他再一次把我们带回欧洲的土地,在那里,爱琴海边可以慵懒地享受着阳光与海洋的气息,然后前往奥林匹斯,去品味希腊人同性的健壮体格与完美心灵。当站在希腊的土地上还没有欣赏够希腊艺术古典时期的和谐与精准之时,亚历山大帝国与接下来的罗马帝国吞并了这里,却被这里的文化所融化……当时间迈入漫长的中世纪时,骑士们身穿铁甲,在身边骑着战马呼啸而过。基督教举办仪式的地下墓窟布满壁画,这时的艺术仿佛退化了,更多地宣传着基督教的教义,画面造型简单缺乏立体感,象征性占了上风。蛮族的入侵,造成欧洲传统文化与艺术的隐退,却带来极其精湛的诸多手工艺品。

在欣赏欧洲中世纪的艺术品同时,还可以跟着艾黎·福尔去体会修道院里的隐修生活。生活在欧洲土地上的法国人,对欧洲的文化传统自然耳濡目染,然而中世纪的跨越有一千年之久,这个时期的欧洲相对黑暗,基督教几乎主宰了整个欧洲。然而,这个时期的中国、日本、印度这些亚洲国家,艺术正如火如荼,灿烂发展,共同丰富着人类的精神世界。这个时期的恒河流域安详而宁静,万物共生和谐发展,印度教和佛教的发展推动了艺术的多元化;日本也顺应着自然,那里庙宇众多,佛教也开始发展,浮世绘的版画展现了典型的和风印象。伊斯兰的清真寺在沙漠中闪现着大地与洁白的色彩。关于中国的描述,中国人自然会有更好的理解,但是艾黎·福尔这位法国人,却有他特有的视角。无欲无求、自省、神秘、遥远、晦涩……这些是他描述中国所用最多的词汇。即使如此,艾黎·福尔还是努力描绘着中国绘画与书法的关系,描绘着中国人特有的伦理、道德、智慧和信仰。

从非洲到大洋洲再到南美,沿着赤道的轨迹横穿

兴的到来,让艺术的重心再次回归欧洲。作者饱含着热情,让马萨乔、达芬奇、波提切利等等众多的艺术名家纷纷云集,共同体现着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涵。进入17世纪,各大艺术流派走向历史舞台,佛兰德斯地区的艺术大师鲁本斯用旋动的笔法把巴洛克艺术推向高潮,而这个时期的荷兰艺术则非常朴素,常常表现着寻常人家的普通生活。法国普桑和洛兰的古典情怀,拉图尔对黑暗与烛光的热衷,洛可可华丽艺术的表现者华托,以及体现了艺术又重新让位于生活的风俗画家夏尔丹,都展现了法国艺术在这两百年间的丰富性。英国的艺术也在这个时期崛起,这里有绿色的园林艺术和多变的风景,透纳笔下的大海与火焰引发了印象主义的浪潮。

19世纪的艺术,法国独领风骚。艾黎·福尔热忱地讲述了这个令法国人无比自豪的时期。随着德拉克洛瓦这头“浪漫主义狮子”的第一声怒吼,浪漫主义席卷而来。库尔贝、米勒、杜米埃的现实主义,卢梭、柯罗的乡间风景,全面展现了一个时代的社会环境。随着19世纪60年代印象派的崭露头角,莫奈、雷诺阿、毕沙罗……这些伟大的画家敏感地捕捉着光与影瞬间的色彩。而塞尚、梵高、马蒂斯的艺术更是突破了传统,为人类的艺术谱写了崭新的现代辉煌。

值得一提的还有这套书的封面和版式都很有特点。五本书的封面非常抢眼,有种时尚杂志的感觉。在书的体例编排上,编者插入了各个时期的大事记年表,这和作者的思路是一致的,艺术的背后,还有历史、政治、文化等等。要想了解一个时期的艺术,就该同时(或之前)对一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了如指掌。五本书,从古至今,五个时期,每本书都有一个主题颜色。此外,了解艺术,图像的作用非常重要。这套艺术史从书中几乎每页都至少有一张图像,根据文中当页的重要线索和需要理解的关键点,书中几乎都有对应的配图。图像的力量是强大的,它让读者非常直观地接近艺术,文字的抽象和图像的具象结合,让艺术一下子鲜活起来,触手可及。书中的文字两旁留有空白,每一张图片都注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和描述。除此之外,在碰到重要的名词和重要的艺术家时,空白处也标有注释,例如“珐琅”、“波利尼西亚”、“犍陀罗”、“塞易斯”等等,这些艺术史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名词,也许作者在文章中只是一带而过,我们并不能很好地理解,但空白处的图注和名词解释,让读者在艾黎·福尔散文化的文字之外,对关键信息一目了然。

阅读艾黎·福尔一段又一段的文字,仿佛获得了一把又一把的钥匙,这些钥匙开启了一扇又一扇的艺术大门。然而门开了,眼前的风景实在太多,我们只有一步一步地走进去,慢慢欣赏;一点一点地,慢慢品味。

(《法国人眼中的艺术史》,艾黎·福尔著,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8月出版)